

宋金交聘制度研究 (1127—1234)

李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国平 主编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博士文库

宋金交聘制度研究

(1127—1234)

李辉著



王国平 主编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博士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 / 李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325-7425-4

I. ①宋… II. ①李… III. ①官制—研究—中国—宋代
②官制—研究—中国—金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118 号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

李辉 著

责任编辑 颜晨华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编: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47 千

印数 1—1,300

版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5-7425-4/K·1942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
项目编号 09 J D N S 0 0 4 Y B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编撰指导委员会

主 任 王国平

副主任 叶 明 翁卫军 顾树森 张鸿建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水照 方建新 史及伟 孙 璐 阮重晖
朱瑞熙 沈 翔 汪圣铎 张其凡 何忠礼
李裕民 陈智超 周 膺 徐吉军 唐龙尧
曹家齐 魏皓奔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国平

执行主编 沈 翔 何忠礼

执行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建新 孙 璐 周 膺
范立舟 唐龙尧 徐吉军

编撰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晓宁 李 辉 魏 峰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
项目编号09J D N S 0 0 4 Y B

序 言

徐 规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重建宋政权。不久,宋高宗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并将此地称为行在所,成为实际上的南宋都城。

南宋自立国起,到最终为元朝灭亡(1279),国祚长达一百五十三年之久。对于南宋社会,历来评价甚低,以为它国力至弱,君臣腐败,偏安一隅,一无作为。但是近代以来,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却有不同看法,如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

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

^① 《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出版。

前绝后的。^①

很显然,对宋代的这种高度评价,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邓广铭先生,都没有将南宋社会排斥在外。我以为,一些人所以对南宋贬抑至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同时从南宋对金人和蒙元步步妥协,国土日损月削,直至灭亡的历史中,似乎也看到了它的懦弱和不振。当然,缺乏对南宋史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南宋历史悠久,国土虽只及北宋的五分之三,但人口少说也有五千万人左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政权之稳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南宋社会的认识,不仅要看到它的统治集团,更要看到它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看到它的军事力量,更要看到它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看到它的人心之所向。特别是由于南宋的建立,才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在这里得到较好的传承和发展,不至于产生大的倒退。对于这一点,人们更加不应该忽视。

北宋灭亡以后,由于在淮河、秦岭以南存在着南宋政权,才出现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再一次给中国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从而推动了南宋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显著的进步。

与此同时,南宋又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它具体表现为: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

南宋时候,程朱理学最终形成,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唐

^① 《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仲友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理宗朝以前,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初的二百五十倍^①。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三百九十七所,其中南宋占三百十所^②,比北宋的三倍还多,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不仅应举的读书人较北宋为多,就是一般识字的人,其比例之大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

通观整个南宋,除了权相秦桧执政时期,总的说来,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借助于史学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作为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通过著书立说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许多人将刻书卖书作为谋生的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家辈出,他们治史态度之严肃,考辨之详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四川、两浙东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都是重要的史学中心。四川以李焘、李心传、王称等人为代表。浙东以陈傅良、王应麟、黄震、胡三省等人为代表。江南西路以徐梦莘、洪皓、洪迈、吴曾等人为代表,福建路以郑樵、陈均、熊克、袁枢等人为代表。他们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也创立了新的史学体例,史书中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

^① 《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三九。

^② 参见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集,第111-115期,1929年12月至1930年出版。

重大影响。

四是公私藏书十分丰富。

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重建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秘书省,规模之宏大,藏书之丰富,远远超过以前各个朝代。私家藏书更是随着雕板印刷业的进步和重文精神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发展。两宋时期,藏书数千卷且事迹可考的藏书家达到五百余人,生活于南宋的藏书家有近三百人^①,又以浙江为最盛,其中最大的藏书家有郑樵、陆宰、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尤袤、周密等人,他们藏书的数量多达数万卷至十数万卷,有的甚至可与秘府、三馆等。

五是文学、艺术的繁荣。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璋先生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八百七十三人中,北宋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南宋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代,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却大大超过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玠、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南宋的民俗风情,宗教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今天的中国也有着深刻影响。

南宋亦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

^① 参见《中国藏书通史》第五编第三章《宋代士大夫的私家藏书》,宁波出版社2001年出版。

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①此话当然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而言,在南宋都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别的暂且不说,仅就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上,并制成为罗盘针使用这一点来看,它就为中国由陆上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意义十分巨大。再如,对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的活字印刷术虽然发明于北宋,但这项技术的成熟与正式运用却是在南宋。其次,在农业、数学、医药、纺织、制瓷、造船、冶金、造纸、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可以说:在西方自然科学东传之前,南宋的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南宋军事力量虽然弱小,但军民的斗争意志却异常强大。公元1234年,金朝为宋蒙联军灭亡以后,宋蒙战争随即展开。蒙古铁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它通过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就灭亡了西夏和金,在此前后又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横扫了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大片土地,前锋一直打到中欧的多瑙河流域。但面对如此劲敌,南宋竟顽强地抵抗了四十五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从中涌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南宋军民不畏强暴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他们与前期的岳飞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古人有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近人有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前者是说,认真研究历史,可为后人提供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少犯错误;后者是说,应该吸取历史上一切有益的东西,通过去粗取精,改造、发展,以造福人民,总之,认真研究历史,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有利于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幸福的社会。我觉得南宋可供我们借鉴反

^① 《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译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思和保护利用的东西实为不少。

以前,南宋史研究与北宋史研究相比,显得比较薄弱,但随着杭州市社会科学院主持的50卷《南宋史研究丛书》编撰出版工作的基本完成,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改变。但历史研究没有穷尽,关于南宋和南宋都城临安的研究,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也还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近日,欣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拟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南宋史研究,同时出版博士文库,加强对南宋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对杭州凤凰山皇城遗址综保工程,也正从学术上予以充分配合和参与,此外还正在点校和整理部分南宋史的重要典籍。组织编撰《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对于开展以上一系列的研究,我认为很有意义。我相信,在汲取编撰《南宋史研究丛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系列丛书一定会进一步推动我国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对杭州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莫大的贡献,故乐为之序。

2010年11月于杭州市道古桥寓所

引 言

以“关系史”为主题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包含了国与国之间的范畴,也包括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天下秩序、世界秩序,其实一也。

关于“天下”这一词语,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一种看法认为,天下是超越了民族、地域,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世界,以田崎仁义、平冈武夫、西岛定生、堀敏一诸氏为代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天下等同于中国、九州,以山田统、安部健夫为代表^①。渡边信一郎在此基础上提出,古文经学家与今文经学家构想出两个不同的天下观:古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以天子统治的王城为世界中心,依照九州—四海(天下)—四荒—四极的顺序重层展开,天下是包括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今文经学系统将天下理解为由同一语言圈、同一交通圈、同一文化圈所构成的九州^②。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外交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的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琉球群岛,包括某些时期的日本;第二个是内亚圈,同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第三

^① 参见[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第9—17页。

^②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66—76页。

个是外圈,包括日本、东南亚、南亚以及欧洲^①。费正清此段论述是在考察清代中国与外邦的关系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的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不断地将这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地保存下来^②。费正清这一说法对不对?他的这一猜测有无道理?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就有多个民族生活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王朝更迭,民族兴衰,似乎很难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永久”?

10—13 世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充满政局变革的时期,传统上的中原汉族政权已不占绝对优势,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先后策马南下。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看待这些来自草原上的“异民族”?这些“非汉族”政权又是如何处理与中原政权的关系?费正清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放置于其它朝代是否还成立?本书将以南宋与金的关系为切入点,思考以上问题。

一、朝贡制度与交聘制度

费正清将中国“世界秩序”概括为“朝贡制度”。他早在 1941 年,就与邓嗣禹合写过一篇长文《论清代的朝贡制度》^③。在这篇文章里,他们认为中国人朝贡的观念自商代起就有了。中原超越“四夷”,依靠的是文化,而非武力,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汉字为介质而推行的中国生活方式。费正清所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从中国历史出发,构建了一个以传统中国为中心的三个“同心圆”文化圈体系。这一理论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兴趣,对此进行了部分修正和质疑。例如杨联陞就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④。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罗萨比(Rossabi)组织了

① 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载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2 页。

② 同上,第 1 页。

③ John King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1 6(2), pp135—246.

④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1—14 页。

一次学术会议,讨论10—14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并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编辑了书名为China among Equals的论文集。这实际上就是对费正清理论的修正,认为在10—14世纪的中国已经存在一种稳定和平等的外交关系,而不是像费正清所提出的由中国主导的不平等的朝贡关系。

“交聘”这一概念出现得很早。交,《说文》在交部,云:“交胫也。从大,象交形。”^①可知“交”是一个象形字,引申之义为互相。聘,《说文》:“聘,访也。从耳,𠂔声。”^②访是一个平等的字眼,不含褒贬。故知“交聘”本义是相互访问。利用四库检索系统“史部”检索“交聘”二字,宋以前,唯《宋书》、《北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出现“交聘”二字。例如,《宋书》卷七五《颜竣传》载:“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亲之所招。历稔交聘,遂求国婚,朝廷羁縻之义,依违不绝……”^③又如《北齐书》卷三五《陆印传》载:“自梁、魏通和,岁有交聘,(陆)印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赋诗……”^④逯耀东认为,南北朝时期,南北间的外交关系和春秋时代诸国间的外交关系相似,例如北魏与南方的宋、齐、梁三朝,双方时常维持着平等的外交立场,外交礼节皆以平等为原则。而沃斯(Edmund H. Worthy)研究了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外交,认为五代时南方诸国之间普遍存在着外交上的对等关系^⑤。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正可以说明何以唯南北朝、五代时期的史料中出现“交聘”二字。

“交聘”二字在《宋史》中频频出现,《金史》甚至专门列有《交聘表》,这说明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以“交聘”为主。此外,宋人文集中出现的“交聘”概念,则更能说明问题。例如,宋人宋庠(996—1066)在《崇政殿与枢密院同答手詔》中,分析宋辽关系,认为辽国“舍交聘就战斗,则悖逸而向劳,绝岁输谋掠夺,则利轻而害重”^⑥。此处,即将宋辽和好的关系称为“交

① 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定,中华书局2013年,第213页。

② 《说文解字》,第250页。

③ 沈约:《宋书》卷七五,中华书局1995年。

④ 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五,中华书局1995年。

⑤ Edmund H. Worthy, JR: Diplomacy for Survival: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ueh, 907—978,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pp17—44.

⑥ 宋庠:《元宪集》卷三二,武英殿聚珍本。

聘”。北宋甚至在抚问辽使的诏书中,亦明确将宋辽往来称为“交聘”。例如《班荆馆赐契丹贺正旦人使到阙酒果口宣》云:“卿等岁律更端,邻欢交聘,载驰使传,方及国郊,宜推宠锡之恩式,示眷怀之厚。”^①南宋亦视与金的交往为“交聘”。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南宋朝廷公文中出现了“交聘”这样的提法。例如在南宋人的文集中就保留了这样一份公文,其题为《甲戌九月间传闻盱眙军得泗州关牒欲再行交聘之礼拟作议状》^②,从这份公文中可以看出南宋的官方文件确将宋金之间的交往称为“交聘”。

朝贡之概念则完全不同。“贡”,《说文》曰:“献功也,从贝,工声。”^③宋人对“朝”与“聘”的概念分得很清。例如“天子之与诸侯,诸侯之与邻国,皆有朝礼,有聘礼。朝则相见,聘则相问也”^④。可知诸侯见天子曰朝,诸侯之邦交曰聘,朝与聘是有严格区别的。

宋代之朝贡制度与交聘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以国家实力的不同而区分对待。北宋时,鸿胪寺掌管外事往来,因对象的不同,分设机构处理:“其官属十有二: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贡奉之事。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贡奉之事。”^⑤其中,处理对辽事务,设往来国信所,其往来之事,称之为“交聘”。而对于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小的国家则有都亭驿、怀远驿等机构,其往来之事,称之为“朝贡”或“贡奉”。由此知宋代的外交制度是二元制,既有朝贡制度,亦有对等的交聘制度,以对方实力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对于宋、辽、金之往来,清人亦敏锐地意识到,宋、辽、金之间的交聘是不同于“蕃国朝贡”的关系。秦蕙田曰:“宋、辽、金交聘与蕃使朝贡有别,因无类可归,故附见于此,而著其说云。”^⑥对于宋辽关系,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

①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八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曹彦约:《昌谷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说文解字》,第126页。

④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四八《聘仪第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中华书局1985年,第3903页。

⑥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聂崇岐考查宋辽互派使节的情况、国书之体例,使节之仪注说:“惟宋辽平等互待,一切聘问礼文,大致相仿,由宋之如何待辽,即可窥辽之如何待宋。”^①陶晋生以澶渊之盟为例,认为宋辽间交往是平等的^②。以上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相同的结论,认为宋辽之间是对等的,与传统上的朝贡关系大不相同。

宋金关系与宋辽关系相比,有不同之处,但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从南宋这方面来说,亦是二元制,仅将与金国的往来称为交聘,而对回鹘、西南诸夷则用朝贡制度相待^③。考察金国的政治体制,在外交方面亦是二元制,有以“交聘”待之者,亦有令其“朝贡”者。《金史》有《交聘表》,记载与南宋、西夏、高丽使者往来之事,而在记载与回鹘等国往来时,则使用“朝贡”。例如《金史》卷四记载:“(天眷元年,1138)八月甲寅朔,颁行官制。癸亥,回鹘遣使朝贡。”^④南宋、金实行的对外政策,以对方实力大小而区别对待,是双方博弈的结果。

二、宋金关系史研究概况

(一) 宋金关系史研究从清代就已开始。如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提出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而且还注意到宋、辽、金、夏各国交聘礼仪^⑤。前辈们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开拓性质的,至今仍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二) 民国时期,宋金关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40年代。由于这一时期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反映在学术上,宋代外交、宋金联合攻辽、秦桧主和与南宋大局的关系、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和岳飞抗金救国斗争,成为研究热点。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谢谔徵《宋之外交》^⑥、黄现璠《宋代

① 聂崇岐:《宋辽交聘考》,《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第283页注2。

②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年,第15—42页。

③ 参看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6—236页。

④ 《金史》卷四《本纪第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73页。

⑤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黄寿成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3页。

⑥ 谢谔徵:《宋之外交》,上海大东书局1935年。